

## 父亲的一九四二



年轻的学生兵的家庭合影。

纸上中国

本报记者 张黎姣

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闹了大饥荒，陪都重庆遭到轰炸。就在这一年，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支学生军奔赴滇缅战场。

在这些投笔从戎的青年学子中，很多都是名门之后，邓述义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是中国大裕华纱厂的老板张松樵，人称“棉纱大王”。

抗战时期，邓述义有太多机会到国外留学深造或者明哲保身地远离战场，“但是在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可言”。邓述义记得有一回“日机来了好久也没回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

最终，邓述义不顾父母的劝阻还是投笔从戎，成为重庆参军第一人，把自己从高中生变成一名特种兵，与10万中国学生一起组成了学生军。

最近刚刚出版的《父亲在一九四二》的作者邓贤，即邓述义之子，历时3年，以父亲和他的战友为原型塑造了一群远征印缅的学生兵形象。可以说，《父亲在一九四二》真实还原了那段父亲经历的特殊历史。

抗战后期，后方兵源几近枯竭，南京政府派遣远征军出征缅甸遭遇惨败，日军趁机攻占缅甸，切断了中国通往外部的最后一条生命线——滇缅公路。当时在校学生可免服兵役。但是在国家最艰



邓述义当兵时的旧照。

难的时候，以邓述义为首的学生兵选择了上前线。

邓述义不断获悉前线的消息。“去杀日本鬼子”的念头始终在起作用，最终他走进了重庆兵役署。那一年，邓述义只有17岁。临别时，母亲送他一块欧米茄金表，为的是让他吃不了苦或后悔时，能换张回程的机票。

邓述义所在的部队从重庆步行到昆明，从昆明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他们

接受了英美盟军的现代化装备，学习盟军的现代化作战理念，掌握先进武器与盟军互相配合、并肩作战。

学生军面对的最凶的敌人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的日军师团。这支部队曾经发动过“卢沟桥事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他们都曾参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从马来西亚登陆，一个师团迫使新加坡7万多名英军投降。他们曾大败英美盟军和

第一次入缅的中国远征军。他们是中国军队的“老冤家”。

然而，它败给了年轻的中国驻印军。八年抗战，敌强我弱，正面战场历次重大战役，多以中国军队失利和国土沦陷而告终，唯有反攻印缅之战成为日本人的噩梦。除了现代化的装备，这支年轻的军队靠什么战胜强敌？邓贤相信，历史之谜就隐藏在一个个学生兵身上。

统计数据表明，在远征印缅作战的学生兵中，大学文化程度约占20%，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0%以上，粗通英文或者具有较高英文水平者约占四分之一。这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邓贤认为：“这样一支高学历的军队，相信即使是二战时期的英美盟军也无出其右。”

这些年轻人在军队中体验到训练的艰苦，受过窝囊气，被打过板子，他们“原以为到印度从军只是个决心问题”，后来才发现现实与愿望相去甚远。战争的残酷改变了他们。邓述义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不断有人在战争中阵亡，他们被装进一只只黑色的裹尸袋，被大卡车运走。但这些学生兵在磨砺中也找到重挫敌人的信心，他们没有忘记自己奔袭从戎的初始目的。

终于抗战胜利了，远征军即将回国。但这支队伍回国后又遇到了解放战争。一时间，队伍土崩瓦解，所谓的王者之师名存实亡。后来，邓述义和他的战友大多重返校园继续念书，走上了知识精英科学救国的道路。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特殊历史岁月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了不公正对待。那段慷慨悲

## 三联书店捐资30万元 重建昭通受灾小学

本报记者 张黎姣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发生的灾难牵动人心。灾难中有让人不忍直视的死亡，也激发了撼天动地的大爱。以“建设文化”为己任的三联书店全体员工紧急行动。以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为首的领导班子在紧急征求员工意见后，决定出资30万元重建被地震摧毁的彝良县云落小学，彻底改善办学条件，使失去校舍的孩子们尽早在安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上课，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重建。

日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其下属的《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等一行五人，昼夜兼程来到彝良县城。彝良县教育局领导非常支持三联书店的捐建意愿，双方很快达成了捐助建校意向。



三联捐建云落小学仪式于近日举行。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和彝良县教育局副局长周光富，分别代表各自单位签订了捐建协议——三联书店出资30万元重建被地震摧毁的云落小学，由彝良县教育局监督校舍建设质量和进度，确保其在2013年2月竣工并投入使用。在简朴的捐赠仪式上，角奎镇中心学校校长潘华军代表云落小学师生向三联书店员工表达了诚挚谢意，表示尽快建好学校、用好学校，不辜负捐建者期望。

在落实捐建云落小学事宜的同时，樊希安总经理还带领《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冒着大雨和余震落石的危险，穿过被地震和泥石流严重损毁的道路，到震中洛泽河镇等地采访，深入了解地震造成的破坏和灾区人民抗灾自救的事迹。

虽然地震震级并不算特大地震，但由于彝良周边复杂的地貌地质，其县城正处于被重山包围夹裹的位置，导致受灾情况严重，当地很多村民房屋倒塌，和外面连通的重要交通道路中断，也时刻被山体的塌方所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一行几人为了获得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各种困难，很快进入彝良，并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震源中心洛泽河镇。由于时有余震发生，通往洛泽河镇的山路不时出现塌方落石，十分危险。他们的车子在行进过程中，随时需要铲土机开道。

他们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从洛泽河镇回来，在彝良县城内又走访了三处临时安置点，从灾民和驻地志愿者那里获悉了最真实的信息。并采访了县城最大的人民医院和抢险救援先锋——昭通驻彝良的武警支队支队长。

他们发现，与之前获知的灾民都撤离的信息有所不同，洛泽河地区的一些灾民虽然房子已被毁坏，但仍留在村镇。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家園，不愿意走。同时他们也谈到如果离开这里，可能会面对颠沛流离的生活处境，甚至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很可能会不得已而讨饭度日。由此可见，一场灾难中的经济损失、伤亡数字只是灾难的表层，而灾民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迷茫则可能是更深层、更广泛的心理问题。灾后重建需要一整套完善细致且深入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但任何一个善意的举动，哪怕再小，都被需要。

据悉，杰里·克利弗此次中国巡讲将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进行。

独立书评

刘瑜

我们一定还记得坐在地坛思考人生的史铁生，我们从他的《我与地坛》里读懂了高度。《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作者凌志军以患者和记者的双重身份，既作为亲历者现身说法，又以记者的犀利眼光体察剖析，呈现了中国医疗体系的诸多问题与弊端。更重要的是，他教我们读懂了乐观和勇气。他在发病时曾写下“十件最想做的事”。其中第十项是：告诉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癌症并不可怕。《重生手记》可说是一个“向死而生”的传奇，是一本“生命之书”。《重生手记》近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与中

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版，它得到毕淑敏、柴静、何裕民、于莺等众多名家的联袂推荐。

“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何裕民颠覆了中国人“癌症是绝症”的惯性思维。他说，“很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高度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应该理性对待、善用智慧以合理防治。”

凌志军认为：“我们最大的不幸在于被中国式的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医疗。”他认为，我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也存在致命的偏差。“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就已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

2007年2月，凌志军被诊断“肺癌、

脑转移”的概率为98%，即“肺癌晚期”。北京、上海两地名医会诊，几乎一边倒地判定他活不过3个月。

今年3月15日，新一轮复查结果：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癌胚抗原指标回归正常，脚踝骨的阴影正在淡化，手术后幸存的那片肺叶生长壮大起来。

在治疗期间，凌志军发现，病人们花了钱、排了长队、内心所期待和倚重的一流医院的“特级专家会诊”，才不足三秒钟。医生冷漠的“你等着吧”的“诊断”几乎就是一纸死亡判决书。手术、化疗等高科技治疗和开“天价特效药”，是不同医生的相同手段。而忧心忡忡、愁眉苦脸、排队就医甚至倾家荡产的那个弱势群体，就是中国癌症患者的群像。

在这本书中，凌志军提出一个严肃的

课题：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不能做到的国内医疗部门，与医生的误诊率乃至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

书中提供了一组数据：全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是200万，许多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

在过去30年中，我国癌症患者的数量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2012年，全世界死于癌症的人有可能超过1000万。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宣布，1/3的癌症可以预防，1/3可以根治，1/3经过治疗可以长期生存。

作者凌志军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资深记者，是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他从事记者工作30多年，报道过无数精彩的新闻事

## 凌志军：一个“向死而生”的传奇

——评《重生手记》

独立书评

刘瑜

我们一定还记得坐在地坛思考人生的史铁生，我们从他的《我与地坛》里读懂了高度。《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作者凌志军以患者和记者的双重身份，既作为亲历者现身说法，又以记者的犀利眼光体察剖析，呈现了中国医疗体系的诸多问题与弊端。更重要的是，他教我们读懂了乐观和勇气。他在发病时曾写下“十件最想做的事”。其中第十项是：告诉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癌症并不可怕。《重生手记》可说是一个“向死而生”的传奇，是一本“生命之书”。《重生手记》近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与中

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版，它得到毕淑敏、柴静、何裕民、于莺等众多名家的联袂推荐。

“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何裕民颠覆了中国人“癌症是绝症”的惯性思维。他说，“很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高度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应该理性对待、善用智慧以合理防治。”

凌志军认为：“我们最大的不幸在于被中国式的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医疗。”他认为，我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也存在致命的偏差。“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就已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

2007年2月，凌志军被诊断“肺癌、

脑转移”的概率为98%，即“肺癌晚期”。北京、上海两地名医会诊，几乎一边倒地判定他活不过3个月。

今年3月15日，新一轮复查结果：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癌胚抗原指标回归正常，脚踝骨的阴影正在淡化，手术后幸存的那片肺叶生长壮大起来。

在治疗期间，凌志军发现，病人们花了钱、排了长队、内心所期待和倚重的一流医院的“特级专家会诊”，才不足三秒钟。医生冷漠的“你等着吧”的“诊断”几乎就是一纸死亡判决书。手术、化疗等高科技治疗和开“天价特效药”，是不同医生的相同手段。而忧心忡忡、愁眉苦脸、排队就医甚至倾家荡产的那个弱势群体，就是中国癌症患者的群像。

在这本书中，凌志军提出一个严肃的

课题：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不能做到的国内医疗部门，与医生的误诊率乃至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

书中提供了一组数据：全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是200万，许多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

在过去30年中，我国癌症患者的数量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2012年，全世界死于癌症的人有可能超过1000万。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宣布，1/3的癌症可以预防，1/3可以根治，1/3经过治疗可以长期生存。

作者凌志军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资深记者，是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他从事记者工作30多年，报道过无数精彩的新闻事

##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

俞可平

100多年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一直是农业工业化的中心议题之一。近代仁人志士为农地产权制度的构建创新苦苦求索，都未能找到良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创立了中国现代农地产权制度模式，回答了农地公有产权与社会公平协调一致的历史难题，推动了农业工业化，农民富裕奔小康，农村社会文明进步。

《马恩“丹麦模式”中国化之路——农地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的作者是一名职业高级检察官。他在一代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农业工业化》的思想基础上，结合参

加中央理论工程建设——马恩“三农”问题经典观点课题研究，对《马恩“丹麦模式”中国化之路——农地土地持有产权制度》进行了深入思考，先后撰写并公开发表了系列文章。其代表作有《马克思土地股份产权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略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意义和历史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国家土地产权制度创设的反思》、《探索建立农地土地持有产权制度——马恩丹麦模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新时期必须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我国农业发展的土地持有产权机制创新》等，建立起了“农地土地持有产权”的新型农地公有产权理论模式，从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农地公有产

权模式、如何使马恩“丹麦模式”中国化、怎样建设中国当代农地公有产权新模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文明进步，破解了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公有产权实现形式的新难题，回应了传统土地公有产权模式对于农村社会力驱动不足的新挑战，为农村第四次改革、完善公有产权制度提供了新模型，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民奔小康、农村文明进步、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

智力支持。

作者还以农地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理论为基础，从产权制度演进的动因、如何界定国有资本产权、建立和完善产权制度体系等作了比较透彻的研究，对土地征收、宅基地流转、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土地股份合作制实施、土地开发整理与农地土地持有产权的耦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补贴制度的创新发展等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进行深入研究，在社会

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受到了学界、实务界及决策高层的认可与高度关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曾称农地土地持有产权制度为“中国马恩丹麦模式”。2004年，中央办公厅将《中国农地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列为决策参考书目。

《马恩“丹麦模式”中国化之路——农地土地持有产权制度》一书是继《中国农地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中国农地土地持有产权制度新论》之后的第三部。它的问世，当会引起理论界的热烈争鸣与高度关注。我们期待这一理论模式能尽快地转化为顶层制度设计，从而有益于中国农业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有益于城乡一体化推进，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书里书外

## 那些藏在书店里的秘密

偶遇塞尔维亚·比琪的第二天，乔伊斯就来到她的书店——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此后十年，他的大多数日子，都在这家小小的书店度过。

可别小看塞尔维亚·比琪——这个毫无书业经验的美国人，最初只想在法国开一家外文书店，结果，“莎士比亚”成了巴黎文学的中心。在那个时代，也就意味着世界文学的中心。它成为左岸艺术家聚集的场所，并且为那些远离故土的“迷惘的一代”作家，提供了一个家。

与20世纪中叶其他书店一样，“莎士比亚”也是一家收费图书馆，顾客注册交费之后，就可以借阅。纪德、杰茨菲拉德、海明威、鹿德、贝克特……这些书店常客的名头之大，往往会吓人一跳。比琪的善解人意，让她大受欢迎——海明威见她刚一会儿，就给她看战争的伤疤；乔伊斯向她抱怨《尤里西斯》出版时遇到的麻烦。它曾经被当作禁书，限制出版。小说出版中最终遇到的麻烦来自乔伊斯本人，他的手稿非常难认，在秘书的打字过程中，他又不停地，大量地修改。

在逸闻趣事中，刘易斯·布兹比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他的故事，书店的故事。“我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随便哪一家书店，我总是充满一种平静的兴奋。这样的文字引导着你，去探寻书店的究竟，以及一个书店的生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利亚斯·卡

内提说，咖啡馆是我们在“人群中独处”的地方，刘易斯认为这话更适合书店，因为它消解孤独的孤独。

在一本看似普通的书里，其实藏着很多秘密。《卡萨诺瓦是个书痴》的作者汉密尔顿，深有体会：我们不在乎一个管道修理工的怪癖和烦恼，不会对约翰·弥尔顿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乐意知道他是躺在床上进行创作的，纳博科夫则在三英寸宽、五英寸长的纸片上写作，济慈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才能写出诗，萨克雷必须在家以外方能才思如泉涌，蒲柏需要烂苹果的腐朽气味激发灵感……

痴迷于书的人，迟早会去研究与书籍相关的一切，研究它不为（大多数）人知的“身世”。尽管，开始是如此的偶然。

刘易斯·布兹比就是这样。他爱上了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从此恋上书店，以至于全家出游时，都不放弃寻找。这个“书痴”少年，后来成为狂妄的乌鸦书店、著名的普林斯书店、的店员，出版社销售员。在书店度过17年后，改行当作家，写了这本《书店的灯光》，娓娓叙述书业的历史，出版业的旧事，书店、淘书、收藏……

斯图尔特·凯利——《失落的书》的作者，专门研究那些消逝无踪的书——它们或被毁掉，或者遗失，或者只是初期构想，未被付诸文字。他会告诉你，诗人霍普金斯在决定将生命献给上帝之时，

烧毁了自己所有的早期作品；被流放的巴赫金用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卷烟抽；托马·曼的《盖亚》是否会像你以为的那样，还未写出就已确定为杰作？纳博科夫从未动笔的回忆录续篇《说吧，美国》，能否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洛丽塔》的创作？

书让太多的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尽管刘易斯说，选择书籍作为礼物是有风险的。“这有点像送人一件尺码不对的毛衣，只是图书要在370万尺码中选择。”可是，爱书的人，在读到一本好书后，时常会迫不及待地向别人推荐，甚至买上几本，兴致勃勃地送人。如果有一天，你在别人的书架上，看到“你的书”落满灰尘却未曾拆封，一定不要失望。

“在我现在居住的书店里，我找到了克劳迪奥·马格利斯写的多瑙河历史和一本全球移民模式的科学研究，还有DNA和语言类的书，它们已经成为家具的一部分”——“家具”，他可真想得出来，这词让人心领神会。

网络时代的实体店书，差不多快成“古董”了，可在记忆中，它总是老样子。瘦瘦高高的书架挨着比肩而立，店员轻轻地走动，不去惊扰你。偶尔，会遇着和你一样常逛书店的陌生人，轻轻点头致意，仿佛旧相识。

冯雪松